



新世纪万有文库

梅光迪文录

■ 罗
岗
陈
春
艳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C82
A1595

梅光迪文录

罗岗 陈春艳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00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光迪文录/罗岗, 陈春艳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938-4

I. 梅… II. ①罗… ②陈… III. 近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07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之江 王丽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8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说明

1922年初，胡适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学衡》创刊号，他看过后，在日记中以少有的轻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见了一本《学骂》

被胡适半亲切半开玩笑称为“老梅”的就是他留学美国时的老朋友梅光迪。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覲庄，安徽宣城人，1890年出生，1911年考取第三届庚款留美，初入威斯康辛大学深造，1913年，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文理学院，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前身）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1887—1923，当时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埋下了《学衡》在南京发刊的因子。1915年春，他读到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1865—1933）的《现代法国批评大家》，十分钦佩，于是，这年秋天梅光迪转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而他与胡适就“文学革命”问题书信往来，相互辩驳，也是在这年暑假。1919年他获得硕士学位，第二年回国出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不久即应刘伯明之邀来到南京高师任教，并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1921年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吴宓也在这年来到东南大学。1922年1月，梅光迪与吴宓、刘伯明等人创办《学衡》杂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经由这些学者的介绍，开始在中国传播。1924

年，他返回哈佛大学任教，此后以旅美时间居多，只是在1931至1932年短期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36年，梅光迪应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担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此后数年是他留在国内最长的一段时期。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梅光迪出任文学院院长，并连任四届国民参政员。1945年去世，享年56岁。

读过胡适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的人，一定对梅光迪印象深刻。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就是他那个著名的“反对者”形象。但是，梅光迪对“新文学”的批评不是由于自己对新观念和新事物的不理解。今天我们已有可能从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读到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件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从胡适抽离脉络的引用中了解他的意思。在1916年3月19日给胡适的信里，梅光迪说：“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智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将来者以津梁，于源足矣。……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耳。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即使他后来极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但在胡适酝酿“文学”变革的早期，梅光迪自己就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他声称之所以不轻易附和认同一切“新潮流”，并非由于“守旧”，而是因为他“too sceptical, too independent”(在梅光迪的信中，原文即为英文，意思是“太过怀疑，也太过有主见”。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请恕之)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胡适和梅光迪对待“新潮流”的态度孰对孰错。坦率地说，胡适对文艺“新潮流”的理解恐怕也非常有限，他在美国时的女友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就是一位具有“达达主义”(Dadalism)画风的现代艺术家，她的画作《双旋律·1916》被费城美术馆收藏在“阿连堡珍藏品”(Arensberg Collection)中。但是，在现有的胡适给韦莲司的两百多封信中，讨论的话题涉及哲学、文学、

宗教、婚姻、政治、外交等等，独于现代西洋艺术，胡适未敢赞一词。在1915年11月6日的信里，胡适对不能欣赏韦莲司的画作深感歉意：“我一想到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画，让你感到非常失望，这让我极为痛苦。有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想告诉你，除非我能摆脱从二手资料中所得的一些成见，并能言之有据，我绝不再强不知以为知地对艺术作品妄下评断。”因此，他只能抽象地赞扬“此在今日为新派美术之一种实地试验”，并且在自己对“白话诗”的“尝试”中将这种“实地试验的精神”(the spirit of experiment)引为同调。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和梅光迪都将中国文学改革放在一个国际——尤其是欧美——的语境里来讨论，不管是文艺新潮还是民族文学。这种跨国际和跨语际的视野当然和晚清以来的社会和知识转型密不可分，任何对中国的论述已不再可能满足于单一的中国视角，而必须考虑到一个空间上更广阔、时间上更长远的，同时还在不断扩张的全球语境以及在这一语境下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它凸显了中国自晚清以来至今可能仍未完全解决的困境：如何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向西方学习，又能够抗拒西方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最近讨论“五四新文化”的性质时所言：“梅光迪与《学衡》的例子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亦即，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真正身份。”

因此，为了给历史反思提供必要的史料，我们这次编选梅光迪的文章，除了将1968年台湾联合出版中心出版的《梅光迪文录》(这个版本是1946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出版的《梅光迪文录》的增补本)的内容全部收入，重新编排之外(为了方便读者，专门请华东师大外文系的庄婷小姐把书中的三篇英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特别从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卷)中把梅光迪致胡适的书信45通和他的《序与胡适交往之始》一文加以整理，收入本书，虽然书信原编次在时间上颇多前后错杂，但在未充分辨析的情况下，仍以维持原貌为宜，只是略加注释，以助读者理解。另外还从胡适《我的歧路》(载《胡适文存》二集卷三)录出梅光迪致胡适的书信1通，也一并

收入。可以说本书是目前收录梅光迪文字最完备的一个本子,包括了他的论文、文章、英文作品、日记、书信和提案等等。附录部分则是梅光迪的传记、浙大版《梅光迪文录》的序言以及各方对他的追思文章。相信它的出版能够为重新描绘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图景添上不可或缺的一笔。

梅光迪学贯中西,他曾拟定一个庞大的跨越东西文化的研究写作计划,譬如中国文化方面的撰述,“有以下数种,曰‘洛下风裁’,述东汉末年党锢事实;曰‘正始遗音’,述魏晋清谈状况;曰‘韩文公评述’,曰‘欧阳公评述’,曰‘袁随园评述’,曰‘曾文公评述’,曰‘中国两大传统评述’。其中‘韩文公评述’,可阐明吾国自唐代以来之文学源流;‘欧阳公评述’则可窥见北宋文化及其士大夫生活之一斑;而‘袁随园评述’,可描写乾嘉极盛时代之景象;‘曾文公评述’则可将中国固有文化最后之光荣表露作一颂词,作一总结。”而关于西洋文化的写作和研究同样容量惊人,“吾拟作以下各种之介绍,曰‘近代西洋思想述要’将自文艺复兴以来之思想于人生上发生效力者,如理智主义、情感主义……以及十九世纪至今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帝国主义等,作一简要说明。纯文学方面则曰‘近代西洋文学趋势’,叙述文学上之各派,……又欲取近代作者声势最显赫者二三十人个别评述。……”(参见1945年2月26日“日记”)从这个也许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计划中不难看出,经过抗战八年“转徙西南天地间”,他仍期望用具体的著述来实现当年《学衡》的理想:“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可惜天不假年,梅光迪就在这年12月27日离开了人世。“千古文章未尽才”,留给后人的只是深深的遗憾。

罗 岗

2000年5月20日于上海

【目录】

本书说明

评提倡新文化者 / 1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 8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 16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 22

安诺德之文化论 / 28

孔子之风度 / 37

九年后之回忆 / 43

言论界之新使命 / 50

斥伪教育 / 55

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 / 59

英美合作之必然性 / 67

卡莱尔与中国 / 75

双谿老人七十寿言 / 86

正和翁七十寿序 / 88

崐有翁六十寿序 / 89

序与胡适交友的由来 / 90

日记选录(1945.2.14—10.15) / 91

致胡适信四十六通 / 111

家书四通 / 183

附：梅先生尊翁教子书 / 187

国民参政会提案二件 / 203

西方在觉醒吗？ / 207

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 / 214

评《白璧德：人和师》 / 229

附 录

梅迪生先生传略 郭斌酥 / 242

梅迪生先生文录序 王焕镛 / 245

梅迪生先生颂 斯泰加 / 247

梅迪生——君子儒 顾立雅 / 249

白璧德——当代一人师 张其昀 / 251

悼梅迪生先生 楼光来 / 259

哭梅迪生先生 贺昌群 / 260

哭迪生 梅李今英 / 270

评提倡新文化者

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欧西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工商制造，显而易见者也。推之万国，无甚差别者也。得其学理技巧，措之实用，而输进之能事已毕。吾非谓国人于工商制造已尽得欧西之长，然比较言之，所得为多。若政制法制，则原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非仅恃模拟而已。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原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窥之益难，采之益宜慎。故国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诟病。惟其难也，故反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仰，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败，尽人皆知，无待余之哓哓，独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犹以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故特揭其假面，窥其真相，缕举而条析之，非余好为苛论，实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诡辩家之名（英文为 Sophist）起于希腊季世，其时哲学盛兴，思想自由，诡辩家崛起，以教授修词，提倡新说为业。犹吾国战国时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希腊少年，靡然从风，大哲苏格拉底辞而辟之，犹孟轲之拒

杨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传柏拉图语录(The Dialogues of Plato)多其师与诡辩家驳辩之词也。盖诡辩家之旨，在以新异动人之说，迎阿少年，在以成见私意，强定事物，顾一时之便利，而不计久远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贻讥明哲，更无论矣。吾国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颇亦类是。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盛行骈体，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各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 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绪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呆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谓思想之在脑也，本为白话，当落纸成文时，乃由白话而改为文言，犹翻译然，诚虚伪与不经济之甚者也。然此等经验，乃吾国数千年来文人所未尝有，非彼等欺人之谈而何。昔者希腊诡辩家普罗塔果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无定，在于个人之我见。苏格拉底应之曰，既人自为真理，则无是非贤愚之分，然则普罗塔果拉斯何以为人师，强欲人之从己乎。今之主文学革命者，亦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须“处处有一我在”而破除旧

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一切模范规律，皆可废也，然则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据讲席，而对于为文言者，仇讎视之，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

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最足动人听闻之说，莫逾于创造，新之一字，几为彼等专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无一不新。侯官严氏曰，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审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惧无意义之可言也。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其所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已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杜威罗素，为有势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 (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 (Verslibre) 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 (Imagism) 之唾余，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庄周曰，井蛙不可以语海者，拘于虚也。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特国人多不谙西文，未出国门，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学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伪学，视通国若无人耳。夫国无学者，任伪学者冒取其名，国人之耻也。而彼等犹以创造自矜，以模仿非笑国人，斥为古人奴隶，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仿西人也，亦互相模仿，本无创造天才，假创造之名，束书不观，长其惰性，中乃空虚无有。彼等之书报杂志，雷同因袭，

几乎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特点之可言。与旧时之八股试帖，有何别异，而犹大言不惭，以创造自命，其谁欺哉。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吾国大师，每诚学者，毋轻著述。曩者牛津大学学者，以早有著述为深耻。夫如是，而后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乃可见。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民国以来，功名之权，操于群众，而群众之智识愈薄者，其权愈大。今之中小学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则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话诗文，与各种时髦之主义乎。盖恒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稚人尤然。其于学说之来也，无审择之能，若使贩自欧美，为吾国夙所未闻，而又合于多数程度，含有平民性质者，则不胫而走，成效立著。惟其无审择之能，以耳代目，于是所谓学问家者，乃有广告以扩其市场，有标榜以扬其徒众。喧呼愈甚，获利愈厚。英谚曰，美酒不需招牌 (Good wine needs no bush)，酒尚如此，况于学问乎。彼等既以学问为其成功之具，故无尊视学问之意，求其趋时投机而已。杜威罗素之在华也，以为时人倾倒，则皆言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之文学，亦为少年所喜者也，则皆言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而真能解杜威罗素社会主义与堕落派文学，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几人乎。学问既以趋时投机为的，故出之甚易，无切实探讨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学政治经济者，所在多有。后生小子，未有不诤为广博无涯涘者。美国有某学者，曾著书数百种，凡哲理算术文学科学及孔佛之教，无所不包，论者以无学问良知

譬之，不许以学者之名。此在美国，有甚高之学术标准，故某学者貽讥当世，不能行其博杂肤泛之学。若在吾国今日，将享绝代通儒之誉矣。东西学者多竭数年或数十年之力而成一书，故为不刊之作，传之久远。今之所谓学者，或谓能于一年内成中国学术史五六种，或立会聚徒，包办社会主义与俄罗斯犹太波兰等国之文学，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夫以功利名誉之熏心，乃不惜牺牲学问如此，非变相之科举梦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来，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国政治外交之险恶，社会之腐暗，教育之堕败，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视，然必牺牲全国少年之学业道德，不为国家将来计，而冀幸获目前万一之补救，虽至愚者不出此。不谓号称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斫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沓、万象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行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又况有爱国大义以迫之，多数强权以扶之哉。其尤捷黠者，则声誉骤起，为国闻人。夫人材以积久陶育磨炼而后成，否则启其骄情之心，易视天下事，终其身无成矣。至于学校内部，各种新名词亦乘机而兴，如“奋斗”、“学生自动”、“校务公开”，意义非不美也，而以置诸中小学生之简单头脑中，鲜有不悞事者。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于未知运思之人，其祸立见”。故今日学生，或为政客利用，或启无故之衅，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然则当世所谓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群众心理，人性弱点，与幼稚智识之浅薄，情感之强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泻水，以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而已”。或又曰，“子之言

亦太苛，教育界现象，岂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过矣，子不闻‘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之说，又顺时而起，以为补救之策乎”。应之曰，“扬子云有云，无验而言之为妄，彼等据教育要津，一言之出，举国响应，乃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诳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为‘应时势之需要’一语，今则时势异于数年以前，其数年以前所主张，已完全失败，故悔而知返，认目前时势之需要，为‘提高程度’‘严格训练’矣。然责任所在，乌可既往而不咎也。军法，战败者以身殉，否则为戮，西国航海家遇险，船亡则与之俱亡。惟言说之士，以其主义祸人，无法律以绳之，只有舆论与良心问题而已。故就舆论与良心问题而论，彼等言而不验者，已无再发言之资格，而犹赧颜曰‘提高程度’‘严格训练’，亦已晚矣”。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不可磨灭者在，非如菲律宾夏威夷之岛民，美国之黑人，本无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简也。而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二十世纪之文化，又乌足包括欧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今则以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创此大业，标袭喧攘，侥幸尝试，乘国中思想学术之标准未立，受高等教育者无多之时，挟其伪欧化，以鼓